

张生:借《投档线》让小说回到现实



张生 受访者供图

眼下,高考考生陆续开始填报志愿。报志愿,有“第二次高考”之称。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作家张生的小说《投档线》近日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可谓正当其时。作品以几个高校真实的高考招生故事为原型,讲述了一次跌宕起伏的招生之旅,揭秘了高考招生工作的台前幕后,令读者对大学教育带给人的深远影响有所思考。

看似颇为反差的是,张生的学术领域之一是法国理论研究,成天和萨特、加缪这些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打交道,此次一个转身,竟在虚拟的小说世界里书写着烟火气浓烈的高招故事。

但在张生看来,写小说和做学术并不割裂,因为用文学介入现实的愿望是相通的。不论是人文学者抑或作家的身份,张生所期望的都是用自己的创作影响社会。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白雁



《投档线》张生 著
花城出版社

小说需要走出“朋友圈”

张生:我这些年来小说写得不是很多,但我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年看文学书特别是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我那些研究文学的同事、朋友、还有我的学生,都很少看小说,尤其是当下的小说。而文学或者小说越来越圈子化,或“朋友圈化”。从作者、到读者、到批评者,再到各种文学奖项的评委,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同质化的“朋友圈”里,并形成了一个自我吞食的“咬尾蛇”一样的“食物链”。因此,文学也好,小说也好,越来越像卡拉OK,自唱自夸,自我奖励自我陶醉。反而像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史学的学者的文章影响越来越大,而大家阅读的也越来越多。文学彻底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朋友圈里而不自知,甚至有的人还因此自鸣得意。但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不能仅仅用影像的影响、网络的发达等原因来解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文学比较脱离现实的生活,或者说对现实的问题关注较弱,缺乏现实的批判精神,导致文学不仅失去了其影响,从现实生活中退出,变成了时代角落的花瓶,这里面的花有很多其实是没有生命的塑料花。所以,我也很想借《投档线》来对高考招生这个题材进行小说创作,从而介入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来尝试一下让小说尽可能地回到现实,回到当下,看是不可以激发自己对小说创作的热情。

张生: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作为大学老师,除了教学科研外,招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过去在交大,现在在同济,都参加过招生工作。所以,对于高考招生工作中招生老师的角色和作用比较熟悉,当然,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其次,不像我们80年代考大学时,因为招生少,基本上还是很个人的事情,所以也没什么人关注。现在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每年的高考已经变成牵动千家万户的大事情,而大学招生每年都是让人关注的热点话题,每年也都有大学之间为了抢生源曝出的各种新闻甚至“丑闻”,比如有年复旦招生老师就因为交大招生老师抢了自己的生源而称交大为“上海西南某高校”,也因此后来成为笑谈。但我发现,因为招生工作的特殊性,很多人因为缺乏了解而对此有误解,我就想把这个过程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外面不了解招生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们和兄弟院校的竞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其实不是的。因为大家只是希望能够招收到优秀的考生。我们一方面是希望学校招到好的学生,另一方面,招生老师的心也是一样的,希望考生能够人尽其才。

张生:我之在交大时来过南京招生,在同济工作时去过青海、甘肃,还有辽宁的一些地方,如丹东等。对于我来说,到每个地方招生都大同小异,大同就是到哪儿都要努力宣传学校,争取优秀的考生报考我们学校,为学校输送好的生源。小异就是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所以给人的感觉也都不一样。比如我在南京招生,和家比较长交流的时候,家长一般都比较理解我们的招生工作,不会要求我们作出确定的承诺才肯让孩子报考我们学校。但是在辽宁,有次我碰到一个家长,就直接要求我们作出录取承诺还要签字画押才肯让学生报考我们学校,但是高考录取的分数线其实不到最后我们也无法确定,所以我们也非常为难。这让人感到不同地方的文化和人情多少有些不同。

张生:我之前很喜欢井上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敦煌》,我非常喜欢。而我到敦煌这座城市还有西北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所以在有机会亲自去敦煌招生以后,就特别想写一部和敦煌有关的小小说,和井上靖的《敦煌》做一个潜在的对话,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文学偶像的致敬活动吧。

张生:我这些年来小说写得不是很多,但我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年看文学书特别是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我那些研究文学的同事、朋友、还有我的学生,都很少看小说,尤其是当下的小说。而文学或者小说越来越圈子化,或“朋友圈化”。从作者、到读者、到批评者,再到各种文学奖项的评委,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同质化的“朋友圈”里,并形成了一个自我吞食的“咬尾蛇”一样的“食物链”。因此,文学也好,小说也好,越来越像卡拉OK,自唱自夸,自我奖励自我陶醉。反而像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史学的学者的文章影响越来越大,而大家阅读的也越来越多。文学彻底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朋友圈里而不自知,甚至有的人还因此自鸣得意。但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不能仅仅用影像的影响、网络的发达等原因来解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文学比较脱离现实的生活,或者说对现实的问题关注较弱,缺乏现实的批判精神,导致文学不仅失去了其影响,从现实生活中退出,变成了时代角落的花瓶,这里面的花有很多其实是没有生命的塑料花。所以,我也很想借《投档线》来对高考招生这个题材进行小说创作,从而介入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来尝试一下让小说尽可能地回到现实,回到当下,看是不可以激发自己对小说创作的热情。

非虚构的事件为虚构的人物服务

张生:您曾经去过哪些地方招生?为什么书中的招考地选在了敦煌?

张生:我之在交大时来过南京招生,在同济工作时去过青海、甘肃,还有辽宁的一些地方,如丹东等。对于我来说,到每个地方招生都大同小异,大同就是到哪儿都要努力宣传学校,争取优秀的考生报考我们学校,为学校输送好的生源。小异就是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所以给人的感觉也都不一样。比如我在南京招生,和家比较长交流的时候,家长一般都比较理解我们的招生工作,不会要求我们作出确定的承诺才肯让孩子报考我们学校。但是在辽宁,有次我碰到一个家长,就直接要求我们作出录取承诺还要签字画押才肯让学生报考我们学校,但是高考录取的分数线其实不到最后我们也无法确定,所以我们也非常为难。这让人感到不同地方的文化和人情多少有些不同。

张生:我之前很喜欢井上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敦煌》,我非常喜欢。而我到敦煌这座城市还有西北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所以在有机会亲自去敦煌招生以后,就特别想写一部和敦煌有关的小小说,和井上靖的《敦煌》做一个潜在的对话,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文学偶像的致敬活动吧。

张生:虽然《投档线》中出现的大学都用了化名,但读者还是忍不住想对号入座,比如,德华大学让人联想到同济大学,北飞让人联想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科技大学联想到中科大,金陵大学联想到南大,之江大学联想到浙大等等,这些各显神通的招生老师,有原型吗?

张生: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

感。首先是大学的名字,其实我最初写的时候用的都是真实的大学的名字,但是我的编辑觉得这样可能会引起大家误解,甚至搞不好那些大学真的来找我打官司,那就麻烦了。所以,我就把大学的名字改成现在这样属于“你懂的”大学名字了。我们很容易把虚构和现实看成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只好让大家联想了。其次,我要说小说里的招生老师大都有原型的,很多人和事都是我在多年的招生过程中所遇到和经历的,但小说毕竟不是报告文学,大学也好,招生老师也好,也都是经过“变形”之后重新塑造出来的,不能和现实画等号。

张生:小说里的一些情节与现实极有呼应,比如之江大学的奖学金事件。在从事文学创作时,虚构与非虚构如何把握?

张生:小说的现实性就是要以一定的现实事件为基础或者背景,或者要有非虚构的成分,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但是小说如果把现实的事件亦步亦趋搬入小说,则失去了其本身虚构的特质。或许,这其中有个重要的因素是小说不仅要讲故事,还要塑造人物,现实的事件并不塑造人物而只是呈现自身,但在小说里,非虚构的事件也要为虚构的人物服务,这就使得即使是真实的真实的事件,一旦经过这样的人物化的处理,也会变得不那么“真实”的原因,也是作家在写作中把握虚构和非虚构的一个原则吧。

希望学生们真正地认识自己

张生: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如今,您认为四十多年间,国人对于高考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张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是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考的大学,那时我们的中学同学绝大多数是考不上大学的,我能考上也是偶然。那时我记得老师们在高考前都对我们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固然好,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不至于天塌下来,或者走投无路。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感觉高考的压力并不大。但现在随着大学教育普及,学生也好,家长也好,社会也好,压力越来越大,对高考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或许是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大学教育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所以对大家对高考还有大学招生也越来越重视。

张生:书中写了几位来自不同家庭的学子,例如徐总的女儿、莉莉、小二等人,请以作家身份想象一下他们目前的处境。

张生:其实高考招生主要还

张生

作家,学者。现为同济大学中文系及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文艺美学专业法国理论方向博士生导师。已出版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等,短篇小说集《乘灰狗旅行》等,专著《时代的万华镜: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还我至尊:巴塔耶哲学思想研究》,译有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波德里亚《美国》等。

是看考生的分数,这也是大学招生之所以成为大家关注的重要的话题的原因。当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教育投入,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兴趣,都会影响到考生高考的成绩,还有专业的选择等具体的问题。对于小说来说,只能是对不同的家境和兴趣的考生的志向进行描写,而对他们各自的未来却很难预测。今年因为新冠的影响可能更难设想考生们当下的状态,只能祝他们心想事成,考上理想的学校,学到理想的专业了。

张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是青年一代新人生的开启,对即将踏入校园的本科生您有何希望?眼下也是毕业季,在招生的同时也送一批学生走向社会,您对他们又有什么寄语?

张生:我想,一个年轻人如果考上了大学,那就要鼓励自己勇敢地思考,尽量接触更多的思想,尤其是和自己之前的思想不一样的思想,这样才可以知道世界的丰富,人生的多元,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真正地认识自己。而当一个年轻人离开大学,走向社会时,那就更要勇敢地认识这个社会,并且力所能及地去建造这个社会,而不是变成一个让自己感到陌生的人。

学术求真,小说求美

张生:聊一个有点偏门的问题。小说当中通过人物角色之口对现代都市建筑风格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请问您对目前许多城市里地标建筑不断推陈出新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张生:这个问题倒是没想到。我在小说里谈论建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比较喜欢建筑,第二个是因为小说情节的需要。不过,其实我对建筑是个门外汉。但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最好能够有传统的延续,“古”为今用,再次就是要有所开放胸襟,“洋”为中用。我们现在的都市建筑在“古”为今用方面也就是传统的建筑风格的延续上做得不好,很多建筑景观都被破坏了,让人觉得很可惜。而“洋”的建筑却又很多都是生搬硬套,生硬地塞进了原来城市的建筑肌理里,让人感到很突兀。说句题外话,作为南大校友,我一直对南大北园北大楼后的两座现代化高楼感到一种现代性的“震惊”,因为北大楼的古典风格与其很不协调,可这也许是中国现实和文化的缩影,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并不像我们想象的结合得那么好,二者的完美融合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

张生:您在深耕学术的同时,又在虚拟小说世界中驰骋,这两种状态有什么不一样?下面还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张生:作学术和搞创作确实是有差别的,学术求真,小说或文学求真、求美。作学术研究时需要分析归纳的思考,是抽象的逻辑的展开,写小说或进行文学创作时需要塑造人物讲述故事以传情,是具体的形象的动作,但是要做好两者都不容易。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做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研究,宗先生也和南京有关,他曾是南大和之前的中央大学的教授,他的美学思想的形成和教学工作主要是在南京展开的。我希望今年夏天可以完成有关他的美学思想的著作。然后,计划秋天开始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